

顧頡剛編著

古  
史

辨

第一册

第一冊

中華民國十五年  
三月出版



古史辨

漢武梁石室畫像

# 古史辨

第一冊 第

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再版發行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三版發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四版發行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五版發行



編著者

顧頡剛

出版者

樸

印刷者

京

總發行者

城

分售處

印

版權所有

書

局

社

北京及各省各大書坊

北平和平門內北新華街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甲種洋宣紙布面精裝本實價貳元肆角  
乙種洋宣紙平裝本實價壹元捌角  
丙種瑞典紙平裝本實價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郵費

Soyez profondément, farouchement véridiques. N'hésitez jamais à exprimer ce que vous sentez, même quand vous vous trouvez en opposition avec les idées reçues. Peut-être ne serez-vous pas compris tout d'abord. Mais votre isolement sera de courte durée. Des amis viendront bientôt à vous : car ce qui est profondément vrai pour un homme l'est pour tous.

(Testament de l'Art de Rodin.)

---

要深澈猛烈的真實。你自己想得到的話，永遠不要躊躇着不說，即使你覺得違抗了世人公認的思想的時候。起初別人亦許不能了解你，但是你的孤寂決不會長久。你的同志不久就會前來找你，因為一個人的真理就是大家的真理。

(譯自羅丹美術的序文)

# 自序

兩年前，我在週報附刊的讀書雜志裏發表辨論古史的文字時，樸社同人就囑我編輯成書，由社中出版。我當時答應了，但老沒有動手。所以然之故，只因裡面有一篇主要的辨論文字沒有做完，不能得到一個結束；我總想把它做完了總付印。可是我的生活實在太忙了，要想定心研究幾個較大的題目，做成一篇篇幅較長的文字，絕不易找到時間，這是使我永遠恨恨着的。

去年夏間，上海某書肆中把我們辨論古史的文字編成了古史討論集出版了。社中同人都來埋怨我，說，「為什麼你要一再遷延，以致給別人家搶了去。」我對於這事當然對社中抱歉，並且看上海印本錯字很多，印刷很粗劣，也不爽快，就答應道，「我立刻編印就是了！」哪知一經着手編纂，材料又苦於太多了，只得分冊出版。現在第一冊業已印刷就緒，我很快樂，我幾年來的工作得到一度的整理了。

這第一冊分做三編。上編是在讀書雜志中作辨論以前與適之玄同兩先生往返討論的信札，是全沒有發表過的。這些信札只就手頭保存的寫錄，當然遺失的還有許多。在這一編裏，可以知道雜志中文字的由來和我對於懷疑古史一件事所以有明瞭的意識的緣故。中編所錄全是在讀書雜志中發表的。其中許多問題雖都沒有討論出結果來，但是我們將來繼續研究的骨幹卻已在這幾篇文字中建立起來了。下編除首二篇外全是讀書雜志停刊以後的通信及論文，有一部分是沒有發表過的。在這一編裏，可以見

出我現在對於研究古史所走的路途的趨向。

第二冊的稿子約略輯成，也分作三編。上編是討論古代史實及傳說的。中編是說明經書真相及批評注解得失的。下編是辨僞者的傳記和評論。這些文字都是數年來在各種刊物上零碎發表的，其中待討論修正的地方很多。只要第一冊出版後有銷場，社中同人容許我繼續出版，我就可寫定付印。

以後我的環境如果不至追逼我廢學，我的胸中所積蓄而且渴望解決的問題正多，自當陸續研究，作文發表，第三冊以下也儘有出版的希望。但不知道我的爲生活而奮鬥的能力能打出一個境界，完成這個志願與否。

現在輯成的兩冊範圍並不限于古史。所以仍用古史署名之故，只因我的研究的目的總在古史一方面，一切的研究都是要歸結于古史的。（例如辨論詩經與歌謠的文字雖與古史無直接關係，但此文既爲一辨明詩經之性質，而詩經中有古史材料，詩經的考定即可輔助古史的考定，故仍收入。）沒有枝葉固然可以把本幹看得清楚，但有了枝葉也可以把本幹的地位襯託出來，所以我不想把枝葉刪芟了。

這幾年中，常有人問我，「你們討論古史的結果怎樣？」我屢次老實答道，「現在沒有結果。因爲這是一個大問題，它的事實在二三千年以前，又經了二三千年來的亂說和僞造，哪裏是一次的辨論所能弄清楚的！」我們現在的討論只是一個研究的開頭呢，說不定我們一生的討論也只是一個研究的開頭咧！」

也有人對我說，「你爲什麼不把幾年來的討論的文字重做一番系統的整理，作成一篇齊整的論文呢？」

「這話固然是好意，但我決不敢答應。我現在在研究上所走的路途的短，成績的少，是大家看得見的，實在沒有把這種一目可盡的東西再做一番系統的整理的必要。況且我所提出的論題全沒有討論出結果來，也無從加以斷定。我並不是沒有把我的研究構成一個系統的野心；如果我的境遇真能允許我作繼續不斷的研究，我到老年時一定要把自己的創見和考定的他人之說建立一個清楚的系統。但現在還誠不到此，還只能見到一點寫一點，做零碎的發表和潤雜的編集。

我非常地感謝適之玄同兩先生，他們給我各方面的啟發和鼓勵，使我敢于把違背舊說的種種意見發表出來，引起許多同志的討論。這個討論無論如何沒有結果，總算已向學術界提了出來，成為學術界上的公同的問題了。我又非常地感謝劉楚賢（掞藜）、胡華人、柳翼謀（詒徵）諸先生，他們肯盡情地駁詰我，逼得我愈進愈深，不停歇于浮淺的想像之下就算是滿足了。我永遠要求得到的幸運，就是常有人出來把我痛駁，使得我無論哪個小地方都會親自走到，使得我常感到自己的學力不足而勉力尋求知識。我在生活上雖是祈禱着安定，但在學問上則深知道這是沒有止境的，如果得到了止境即是自己的墮落，所以願意終身在彷徨覓路之中，不希望有一天高興地呼喊道：『真理已給我找到了，從此沒有事了！』

我自在讀書雜志中發表了推翻相傳的古史系統的文字之後，一時獎譽我的人稱我『燭照千載之前，發前人之所未發』，反對我的人便罵我『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對我懷疑的人也就笑我抨擊古人只不過

爲的趨時成名。也有愛我的前輩肫摯地勸告道：「你是一個很謹厚的人，何苦跟隨了胡適之錢玄同們做這種不值得做的事情！」我聽了這種種的議論，禁不住在腹中暗好笑。我自己知道，我是一個平常的人，決不會比二千年來的人特別聰明，把他們看不清楚的疑竇由我一起看出。我也知道，我是一個很膽小的人，苟非確有所見，也不敢猖狂地冒了大不韙，自己提出一種主張來疑經薦古。至于成名之心，我固然不能說沒有，但總可以說是很淡薄的，我也決不願無故凌辱古聖先賢來造成自己的名譽。適之玄同兩先生固是我最企服的師，但我正因爲沒有崇拜偶像的成見，所以能真實地企服他們；若把他們當作偶像一般而去崇拜，跟了他們的脚步而作應聲蟲，那麼，我用了同樣的方式去讀古書時，我也是古人的奴隸了，我還哪裏能做推翻古代偶像的事業呢。老實說，我所以有這種主張之故，原是由于我的時勢，我的個性，我的境遇的湊合而來。我的大膽的破壞，在報紙上的發表自然是近數年的事，但伏流是與生命俱來的，想像與假設的一構造是一點一滴地積起來的。我若能把這個問題研究得好，也算得沒有辜負了我的個性和環境，沒有什么了不得。若是弄得不好，不消說得是我的罪戾，或是社會給與我的損害了。因爲我對於自己的地位有了這種的瞭解，所以我對於自己的見解（給一般人說爲新奇的）常以爲是極平常的，勢所必然的，我只順着自然的引導，自己無力于其間，譽我和毀我的話都是廢話而已。但譽我和毀我的人，我也不嫌怪，因爲他們只見到我的主張的鋒面，而不能深知道我的個性和環境，也是當然如此。

我讀別人做的書籍時，最喜歡看他們帶有傳記性的序跋，因爲看了可以瞭解這一部書和這一種主張

的由來，從此可以判定它們在歷史上占有的地位。現在我自己有了主張了，有了出版的書籍了，我當然也願意這樣做，好使讀者瞭解我不攻擊我的主張的新面。

因為這樣，所以現在就借了這一冊的自序，約略做成一部分的自傳。我很慚愧，我的學問還沒有成熟，就貿然來做這種自傳性的序文，實在免不了狂妄之罪。但社會上已經等不到我的學問的成熟而逼迫我發表學術上的主張了，已經等不到我的主張的討論出結果來而逼迫我出書了，我為求得讀者對於我的出版物的瞭解，還顧忌着什麼呢。

我是一八九三年生的。當我出生的時候，我的家中已經久不聽見小孩子的聲息了，我是我的祖父母的長孫，受到他們極濃烈的慈愛。我家是一個很老的讀書人家，他們鼓勵我從讀書上求上進。在提抱中的我，我的祖父就教令識字。聽說我坐在「連椅交椅」（未能步行的小孩所坐）裏已經識得許多字了，老媽子抱上街去，我儘指着招牌認字，店舖中人詫異道：「這怕是前世帶來的字吧！」因為如此，所以我瞭解書義甚早，六七歲時已能讀些唱本小說和簡明的古書。但也因為如此，弄得我遊戲的事情太少，手足很不靈敏，言語非常鈍拙，一切的技能我都不會。這種的狀態，從前固然可以加上「弱不好弄」的美名，但在現在看來，只是遇抑性靈，遇作畸形的發展而已。

在這種沈悶和呆滯的空氣之中，有一件事足以打破這寂寥面直到近數年來纔從回憶中認識的，就是

民間的故事傳說的接近。

我的本生祖父和嗣祖母都是極能講故事的：祖父所講大都屬於滑稽一方面，如

「諸福寶（蘇州的徐文長）」之類；祖母所講則大都屬於神話一方面，如「老虎外婆」之類。

除了我

祖父母之外，我家的幾個老僕和老女僕也都擅長這種講話，我坐在門檻上聽他們講「山海經」的趣味，到

現在還是一種很可眷戀的溫煦。我雖因言語的鈍拙，從未複述過，到後來幾乎完全忘記了，但那種風趣卻永遠保存着，有人提起時總覺得是很親切的。祖父帶我上街，或和我掃墓，看見了一塊匾額，一個牌樓，一座橋梁，必把它的歷史講給我聽，回家後再按着看見的次序寫成一個單子。因此，我的意識中發生了歷史的意味，我得到了最低的歷史的認識：知道凡是眼前所見的東西都是慢慢兒地積起來的，不是在古代已盡有，也不是到了現在剛有。這是使我畢生受用的。

當我讀論語的時候，孟子已買在旁邊，我隨手翻着。我在論語中雖已知道了許多古人的名字，但這是很零碎的，不容易連接。自從看了孟子，便從他敍述道統的說話中分出了他們的先後。我初得到這一個歷史的系統，高興極了，很想替它做一個清楚的敍述。以前曾在祖父的講話中，知道有盤古氏拿了斧頭開天闢地的故事，有老嫗和大生出人類的故事；到這時就把這些故事和書本上的堯、舜、禹的記載聯串了起來了。我記得那時先着一家起了幾個早晨，在朝暾初照的窗下寫成一篇古史，起自開闢，訖于滕文公篇的「孔子沒」，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疆曾子，曾子不可」的一段事。孟子敍述道統到孔子為止，我作歷史也到孔子沒後為止，這是很分明的。承受了孟子的歷史觀了。這篇古史約有五頁，那時

還沒有練習過小楷，襯了紅格紙寫得蠅頭般的細字，寫好了放在母親的鏡匣裏。從我所讀的書和母親的病狀推來，那時我是六歲（依舊法算應是八歲）。可惜後來母親死了，這篇東西就失去了。

就是這一年的冬天，我讀完了孟子。我的父親命我讀左傳，取其文理在五經中最易解，要我先打好了根柢然後再讀深的。我讀着非常感受興趣，髮髻已置身于春秋時的社會中了。從此魯隱公和鄭莊公一班人的影子長在我的腦海裏活躍。但我的祖父不以為然，他說：「經書是要從難的讀起的；詩經和禮記中生字最多，若不把這兩部書先讀，將來大了就要記不清了！」所以在一九〇一年的春天，命我改從一位老先生讀詩經。左傳只讀了一冊，就擋下了。

我讀國風時，雖是減少了歷史的趣味，但句子的輕妙，態度的溫柔，這種美感也深深地打入了心坎。後來讀到小雅時，堆砌和嚴重的字句多了，文學的情感減少了，便很有些兒怕唸了，意義愈不能懂得了。我想不出我為什麼要讀它，讀書的興味實在一點也沒有了。這位老先生對付學生本來已很嚴厲，因為我的祖父是他的朋友，所以對我尤為嚴厲。我越怕讀，他越要逼着我讀。我唸不出時，他把戒尺在桌上亂碰，背不出時，戒尺便在我的頭上亂打。在這種的威嚇和迫擊之下，長使我戰慄恐怖，結果竟把我逼成了口吃，害得我的一生永不能在言語中自由發表思想。我耐不住了，大着膽子向先生請求道：「我讀左傳時很能明白書義，讓我改讀了左傳罷！」先生聽了，鼻子裏嗤的一聲，做出很傲慢的臉子回答我道：「小孩子哪裏懂得左傳？」好容易把一部詩經捱完，總算他們順了我的請求，沒讀禮記而接

讀左傳。這位老先生要試一試我以前類乎誇口的請求，令我講解基督教孔父的一段。我一句句地講了。他很詫異，對我的祖父說道：「這個小孩子記性雖不好，悟性卻好。」我雖承蒙他獎讚，但已做了他的教育法的犧牲了！

我的生性是非常桀驁不馴的。雖是受了很嚴厲的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的壓抑，把我的外貌變得十分柔和卑下，但終不能摧折我的內心的分毫。所以我的行事專喜自作主張，不聽人家的指揮。翻出幼時所讀的四書經文和注文上就有許多批抹。例如告子上篇天衛章末有「終亦必亡而已矣」一句，仁之勝不仁章末又有「亦終必亡而已矣」一句，我便刪去了中間欲貴章首的「○」號，批道：「不應有○，下文有「終亦必亡而已矣」之語，可見兩段相連。」又如離婁下篇逢蒙學射章「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我疑心「羿」與「宜」因同音而致誤，就批道：「宜當作羿。」這一類的批抹，在現在看來確是極度的武斷，但我幼年讀書就不肯盲從前人之說，也覺得是不該妄自菲薄的。

約在十一歲時，我初讀綱鑑易知錄，對於歷史的系統更能明白認識。那時，我便自立義法，加上許多圈點和批評。我最厭惡綱目的地方，就是它的勢利。例如張良和荊軻一樣的謀刺秦始皇，也一樣的沒有成功，但張良書爲「韓人張良」，荊軻便書爲「盜」。推它的原因，只因荊軻的主人燕太子丹是斬首的，而張良的主人劉邦乃是做成皇帝的。我對於這種不公平的記載非常痛恨，要用我自己的意見把它改了。可惜我讀的二部易知錄是石印小字本，上邊寫不多字，只得寫上小紙夾在書裏。前年理書時檢得一紙條，是

那時的筆蹟，寫道：

書「秋，秦王稷薨，太子柱立。」至明年冬，又書「秦王薨，子必立。」下目書曰：「孝文王卽位，三日而薨。」夫秋立而至明年薨，亦十七八月矣，何目書「三日而薨」耶？此其史官之訛也。

現在知道，這個批評錯了，因為孝文王的卽位在他的除喪之後，和上一年秋的「立」是不衝突的。只是我敢於寫出疑問，也算值得紀念。

兒時的佚事，現在還記得幾樁。有一次，我看見一個飯碗，上面畫着許多小孩，有的放紙鳶，有的舞龍燈，有的點爆竹，題爲「百子而」。我知道文王是一百個兒子的，以爲這一幅圖一定是畫的文王的家庭了，就想把文王的兒子考上一考。可是很失望，從習見的書中只得到武王、周公、管叔、蔡叔、康叔數人，左傳上較多些，但也只有「文昭」十六國。我在那時很奇怪：爲什麼這樣一個大名人的兒子竟如此的難考？後來知道文王百子之說是從詩經的「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來的，而「百斯男」的話正與「千秋萬歲」、「千倉萬箱」相類，只是一種誣頗之詞，並非實事，心始釋然。

又有一次，不知在什麼地方見到孔子有師七人的話，替他一考居然如數得到。但現在想得起的只有老聃、師襄、弘、鄭子、項橐五人，尚有二人反而查不出了。又因謚法的解釋不同，想做一種謚法考，把左傳上的謚法彙集起來，比較看看。結果，使我知道「靈、幽、厲」諸謚未必是惡謚，孟子所說「孝子順孫百世不能改」的話並不十分可錄。有一回偶然在漢書上看到漢高祖爲赤帝子，斬白帝子，心想赤帝白帝不是和黃

帝一樣的嗎，爲什麼黃帝爲人而赤帝白帝爲神？又在某書上看見三皇五帝的名號和易知錄上所載的不一致，考證之後，始知三皇五帝的次序原來有好幾種不同的說法。那時見到的書甚少，這種考據之業現在竟想不起是怎樣地做成的。

我們顧家是吳中的著姓，自漢以下的世系大都可以稽考。但我們一支的家譜只始於明代成化中，標上唯亭的地名。我的十一世伯祖大來公（其蘊）序道：

人各有所自，必自其所自而後即安。苟忽其所自而妄萌一焜耀之思，指前之二顯人曰：「吾所自者某某也，」則世之人亦因其所自而自之矣。然反之心究有所不安。以己之不安而知祖先之必不安，且念子孫之亦未必安也，何可以焜耀之思累先後之不安乎……

此尼備從姪（嗣曾）之近譜所以不宗鹿城（嵐山）而宗維亭也。維亭距鹿城不數十里，有農家者流繁衍於上二十一都之鄉，地名顧港，此吾支之所自。鄉之先達已蒙稱述，信爲文康公（顧鼎臣）之支矣。而尼備以宗其所疑不若宗其所信，宗其所信而苟有一毫之可疑無庸宗也，所以尊維亭而不敢曰鹿城，重原本也。

這種信信疑疑的態度，在現在看來固是非常正當，但幼年的我哪裏能懂得呢。我只覺得他們的胸襟太窄隘了。我們和嵐山一支既經是一族，爲什麼定要分成兩族？偶然見到一部別宗的譜牒，以西漢封顧余侯的定爲始祖；又列一世系表，起於禹啓，少康中經無餘勾踐，訖於東海王搖和他的兒子顧余侯，期視約有三十餘代。（這個表不知道從哪裏抄來的，現在遍查各種古書竟查不到。）我快樂極了，心想我家的譜牒可以

自禹訖身寫成一個清楚整齊的系統來了！又想禹不是祖黃帝的嗎，黃帝又不是少典氏之子嗎，那麼豈不是又可以推算自己是少典氏的幾百幾十世孫了！我真高興，對着我的同學誇口道：「我要刻三方圖章：一是『勾踐後人』，一是『大禹子孫』，一是『少典雲祀』。」這位同學也贊嘆道：「你家真是一個古遠的世家！」於是我援筆在譜上批道：

甚哉譜必以大宗言也！不以之言，則昧於得姓傳遞之跡而徒見十數世而已。吾族之譜始自允齋公，遂謂允齋公爲始祖。夫公非始得顧姓者，而曰始祖，亦太隘矣！

一個人的思想真是會得變遷的。想不到從前喜歡誇大的我現在竟變得道般嚴謹，要把甘心認爲祖先的禹回復到他的神話中的地位，要把尼備公創立家譜的法子來重修國史了！

在私塾中最可紀念的，是有兩年沒有正式的教師。起先，我的父親在城北姚家教館，我隨着讀書。去了不久，我父考取了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去，館事請人代着。可是代館的總不得長久，代者又請代，前後換了七八人，有幾個月簡直連接着沒有先生。只因姚家待我很厚，他們的小主人和我的交情也很摯，所以我家並不逼我換學塾。這兩年中，爲了功課的鬆，由得我要怎樣做就怎樣做。我要讀書，便自己到書舖裏選着買；買了來，便自己選着讀。我看了報紙，便自己發揮議論。有什麼地方開會，我便前去聽講。要游戲，要胡鬧，要閒談，這當然也隨我的便。這兩年中的進境真像飛一般的快，我過去的三十年中吸收智識從沒有

這樣順利的我看無論哪種書都可以懂得一點了，天地之大我也識得一個約略了。這時候，正是國內革新運動勃發的時候，要開學校，要放足，要造鐵路，要抵制美國華工禁約，要請求政府公布憲法開國會，梁任公先生的言論披靡了一世。我受了這個潮流的濡染，也是自己感到救國的責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議論時事。  
 中國魂中的阿旁觀者文和中國之武士道的長序一類文字是我的最愛好的讀物，和學塾中的屈原卜居，李華弔古戰場文，胡銓請斬王倫秦檜封事等篇讀得同樣的淋漓痛快。在這種熱情的包裹之中，只覺得殺身救人是志士的唯一的目的，為政濟世是學者的唯一的責任。塾師出了經義史論的題目，我往往借此發揮時論，受他們的申斥，但做時務策論時，他們便不由得不來賞讀我了。

一九〇六年，地方上開辦第一班高等小學，考題是徵兵論，我竟考取了第一。我剛進去時，真是踏到了一個新世界。我在私塾中雖是一個新人物，自己已看了些科學方面的教科書，但沒有實物的參證，所謂科學也正與經義策論相同。到了新式學校中，固然設備還是貧乏得很，總算有了些儀器和標本了，能做些實驗和採集的工夫了。我在學校裏最歡喜做的事情是「修學旅行」因為史地教員對於經過的名勝和古蹟有詳細的說明，理科教員又能伴我們採集動植物作標本回來之後，國文教員要我們作遊記，圖畫教員要我們作記憶畫，使我感到這種趣味的活動，各科材料的聯絡，我所受的教育的親切。但除了這一件事之外，我的桀驁不馴的本性又忍不住要發展了，我漸漸地對於教員不信任了。我覺得這些教員對於所教的功課並沒有心得，他們只會隨順了教科書的字句而敷衍。教科書的字句我既已看得懂，又何勞他們費力解

釋。況且教科書上錯誤的地方，他們也不能加以修正。例如地理教科書中說教主出於半島，聖孔佛耶爲證，理由是半島的海岸線長，吸收文明容易；地理教員也順着說。我聽得時就很疑惑，以爲這教的張道陵就很明白不是從半島上起來的，孔佛耶的出在半島不過是偶然的巧合。海岸線的吸收文明應當在海上交通便利之後，在古時則未必便可增進新知（至少在中國是這般）。即如孔子時，江淮河濟的交通勝於海洋，江淮河濟的吸收文明也應當過於海洋；孔子所以能夠特出，或者就靠在河濟的交通上，和半島及海岸線有何關係。但地理教員就咬定了這句話，大張其半島出教主論了。這種的教員滿眼皆是，他們都只會食人家的唾餘，毫沒有自己的真知灼見，都只想編輯了一種講義作終身的衣食，毫不希望研究的進展，使得我一想到時就很鄙薄。

在小學時曾經生了兩個月的病，病中以石印本二十二子和漢義叢書自遣，使我對於古書得到一個浮淺的印象。又在報紙上見到國粹學報的目錄，裏面有許多新奇可喜的文題，要去買時可惜蘇州的書肆裏沒有。直到進了中學堂，始託人到上海去買了一個金分。翻讀之下，頗驚駭劉申叔章太炎諸先生的博洽，但是他們的專門色彩太濃重了，有許多地方是看不懂的。在這個報裏，除了種族革命的意義以外，它給與我一個清楚的提示，就是過去的中國學問界裏是有這許多分歧的派別的。

十六歲那一年，我在中學二年級，我的祖父對我說：「五經是應該讀全的。你因進了新法學堂只讀得《詩經》、《左傳》和半部《禮記》，我現在自己來教你罷。」於是每晚從學校裏歸來，便向祖父受課。他先教我